

组织策动力。查阅建国初期所有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农民协会本身很少组织和发动群众活动,组织形式松散、纪律不严、制度化水平低是全国各地农民协会共同特点。因此,尽管建国初期的民主气氛较浓,但在有关“三农”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农民协会也没能体现出其团体的影响力。其二,缺乏内部凝聚力。由于农民协会严重的行政化,大大削弱它代表和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对参加农民协会根本不感兴趣,有的甚至视为一种负担,造成农民协会缺乏事实上的群众基础。其三,缺乏政治应变能力。建国初期的政治形势变化很快,随着土地改革兴起的农民协会政治应变能力较差,表现在:《农民协会组织通则》没能根据当时政治局

势的变动及时作出修正;工作制度僵化,基本上是靠从上到下的层层布置;工作内容上满足于一时一地数字;工作方法单一。这样,农民协会在建国初期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由于没能与时俱进最终难免退出历史舞台。

【收稿日期】 2004-12-25

【作者简介】 唐明勇(1965—),男,河南罗山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公羽】

从台湾史料看蒋介石“反攻大陆”政策之演变

王侃

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彻底崩溃之后,蒋介石不愿面对失败的现实,提出了“反攻大陆”政策。但是随着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政权的日益巩固,其“反攻”政策虽屡经调整,终成泡影。长久以来,限于资料原因,少有人论及这个问题。即使有那么几篇文章,也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年抓捕台湾派遣特务的公安或军队负责人对某一事件的回忆性描述;另一个方面是研究台海问题的学者把“反攻大陆”政策作为必须交代的历史背景而作的概况介绍。因此,本文根据台湾方面出版的各种史料,对所谓“反攻”政策的来龙去脉做一个详细梳理,以备大家研究参考。

一 “反攻大陆”政策的提出

(一)妄想“三年期成”

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平生第一次提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当时,国民党在大陆已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撤退到台湾。蒋介石不愿面对失败的现实,遂以下野之身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发表了《本党革命的经过与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如果我们一般干部同志真正能笃信主义,实践革命,真能协同一致,坚持到底,那么我可以断言:不出三年,共匪一定不打自倒”。在讲话的末尾,蒋介石还提出了三句口号,为“三年期成”的美梦大吹法螺:“(一)瀚雪耻辱,报复国仇!誓灭共匪,完成革命!(二)精兵简政,缩小单位!自动降级,充实战力!(三)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0~11页)

蒋介石在东南区军事会议上的话音刚落,各地败报便接踵传来。12月13日,心烦意乱的蒋介石被迫宣布国民政府“迁都”台北。不久,重庆解放,宋希濂在峨边被俘。次年3月27日,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西昌解放的消息。至此,大西南160万平方公里疆域全部解放,120万国民党军队大部溃散或被俘获,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块反共基地也不复存在了。同样,“半年整训,革新精神!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口号也失去了其凭藉的依据。

1950年3月13日,惊魂未定的蒋介石为收拾人心,在革命实践研究所发表了名为《复职的目的与使命》的演说:“我去年来到台湾以后,7月间在台北介寿馆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检讨过去剿匪失败的原因,并拟定我们今后反攻的计划和期限。在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提‘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结论。那时候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省,以及陕南,都还在我们的国军手中,所以我认为东南区一年之内开始反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战局变化太快,整个的西北和西南,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全部陷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当时大不相同了,我们要重新来拟订计划,徐图恢复,决不能好高骛远,只求速效。我们知道越王勾践在会稽失败以后,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沼吴。……现在我把去年‘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计划,改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最后,蒋介石又老方一帖,谄了六句口号与他的“同志们”共勉:“刻苦耐劳,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

密,铲除共匪。”(同上书,第135~137页)

(二)变为“五年成功”

4月16日,也就是蒋介石提出“一年整训,二年反攻,扫荡共匪,三年成功”后的一个月零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海南岛。5月18日,舟山群岛也宣告解放。与此同时,解放军在华南各地修建了30个军用机场,400余架战机进驻沿海各地。人民海军也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集结完毕,随时准备起航出击。

5月16日,蒋介石发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为部下壮胆。他先厚着脸皮将一系列的溃败粉饰成有计划的“转进”。“我现在先将政府当时所决定根本大计与步骤,明白报告大家:就是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设三民主义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因此,半个月之前,我们撤退了海南的军队,今天定海的军队也主动的向台湾及其卫星岛上集中了,这就是我复职第一步计划完全实现了。”接着,蒋介石又吹嘘道:“现在兵力集中以后,当然台湾的兵力更加充足了,台湾的防卫亦更加强固了,对于共匪进攻台湾的军事冒险,我们已有将他彻底歼灭的把握,使之片甲不返。总结一句话,今后台湾之地必可立于不败之地。我想你们至此必要问我,究竟你什么时候开始反攻大陆,来救你们同胞?我可很确实来告诉你们:今后三个月内,共匪如果来侵犯台湾,那就是我们国军迎头痛击乘胜反攻大陆的时机,这样三个月以后,我们就可正式开始反攻大陆了。如果共匪始终不敢来侵犯台湾,那我们亦要在一年之内,完成我们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以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现在我再将政府反攻大陆的计划,总括四句话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同上书,第264~266页)

在书告中,蒋介石将“反攻”成功的期限延长了2年。对于他来说,这实在是情不得已的下策。既定方针的变动,对提高国民党的士气不仅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使人们对国民党上层的决策充满了疑虑和不安。

(三)不得不纸上谈兵做方案

根据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确定的期限,“反攻”最迟不得超过1951年5月。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席电示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他们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我沿海驻军随即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对重点地区和岛屿的防守。台湾当局眼见着占不了半点便宜,被迫停止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避免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压迫台湾当局承诺不对中国大陆或中国海域或公海的船只实施攻击。蒋介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明定“反攻”时间表,无异于自取其辱。于是,他悄悄放下鼓吹的法螺,转而加紧设计“反攻”方案,做些纸上谈兵的文章。

1954年11月,“总统府”根据蒋介石的指令,设立“光

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由陈诚任主任委员。25日,蒋介石亲临致词:“今天是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我们对于光复大陆的设计研究工作,今天就是一个开始的日子。本人今天来参加大会,因为本人也是委员的一分子,很愿意和各位同仁共同一致的进行光复大陆的设计研究工作。本会的成立,就是明白的告诉大陆上的同胞们,我们正在同心一德,研究如何打倒共匪的各种暴行,解除大陆人民的痛苦,并为他们复仇雪恨,争取真正的自由。”(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6卷,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283~284页)

研究设计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提出了“反攻大陆”的三种模式。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六届五中全会上将其归纳为:(1)“迫不及待,不问美国同意与否,我们自动的、单独的来反攻大陆”。(2)“等到俄共全面侵略战争发动时,与美国并肩作战”。(3)“在获得美国的同情与支援下,对大陆发动反攻。在这里,“反攻”的重心仍放在“美国的同情与支援”上。1955年10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上对前次提出的三种模式作了修订,宣称:“今后军事反攻行动的三个方法”是:(1)“国军首先单独的反攻,而后大陆同胞群起响应”;(2)“大陆同胞自动的起义发难,而后国军反攻登陆接应”;(3)“我们台湾国军反攻与大陆抗暴运动的发展,彼此呼应,内外夹攻”。他还自欺欺人地说:“默察今天内外的形势,使我益信反攻复国的神圣事业,必定可以在这三个方式之下,来提早发动,加速完成。”(同上书,第371页)

对蒋介石先后提出的两个“反攻”方案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关注的重点已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同情与支援”,转变为寄希望于大陆同胞的“起义”、“发难”、“揭竿而起”。蒋介石之所以有此转变,除了美国不配合他的“反攻”之外,重要原因在于蒋对大陆形势的错误分析。他在国民党七届六中全会闭幕时发表演讲,胡说什么:“共匪内部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业已形成了奸匪朱毛本质上内溃的大危机。从今年三月到今天,半年之间,匪帮内部发生了许多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不证明暴力政权已经发生了过去几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动乱,也暴露了奸伪政权必趋溃亡的真相。……正因为共匪卖国祸民的事迹昭彰,于是大陆同胞的反共抗暴行动,也就风起云涌,遍布了大陆每一个角落。本党今后应如何迎接这一新的革命形势,进而使大陆同胞的抗暴运动,和我们反攻军事结合在一起,对准奸匪,予以致命的打击,实为吾人今日最重要的课题,亦为本党当前最迫切的要务。”(同上书,第370页)

庸庸讳言,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地主富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个体农民、工商业者),真心实意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满怀热情地从事于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在中共党内,通过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使广大党员干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曹聚仁分析大陆形势说:“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

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曹聚仁:《采访新记》,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年版,第254页)

二 “反攻”政策的第一次大调整 ——“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

转眼到了1957年,距离蒋介石在《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中所称“十年生聚”的最后时限已为期不远。如果不对“反攻”政策进行新的调整,恐怕会引起国民党内多数人思想上的混乱和疑虑。于是,蒋介石决定在中国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全党作一个解释和交代。

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作了题为《革命形势与大会使命》的演讲。他先照例与会代表寒暄一通,然后转入正题说:“我们中央党部迁到台湾,八年以来,本党党务的发展,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党的改造时期,当时正是革命挫败,大陆沦陷之后,本党组织极为涣散,纪律亦荡然无存,于是本党中央乃决心改造,清理党籍,整饬阵容,以期复兴本党,稳定革命复国的基地。第二阶段就是四十一年七全大会之后,直至今日重建本党的中兴时期,这一时期本党所持的方针,是在广大群众中,结合其爱国革命分子,重建革命反攻的实力。在自由区,对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种党务和力量,不仅协调合作,来推动台湾建设工作,并且从各项改造运动中,促进国家总动员,来完成反攻的准备。在海外,则集中全力,扩大反共救国阵线,加强反共斗争,打击匪伪分化侨胞的阴谋。至于对大陆的主要工作,就是向敌后加强革命组织,散播革命种子,使其生根茁长,同时加强对匪心理战、政治战和社会战、经济战,策进群众反共抗暴运动。……本党今后第三阶段的任务,可以称为反攻复国时期。所以本大会亦就是要以决定反攻复国的总方略,为其中心任务。”(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7卷,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370页)

根据蒋介石为大会定下的基调,国民党副总裁陈诚作了《政治报告》,指出:“在这五年之中,世界局势有很大变化,我们的革命事业在这中间也有非常显著的进步,我们由保卫台湾进而建设台湾,并由建设台湾更进而策进反攻大陆了。”他进而宣称“反攻复国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台湾,二是海外,三是国际,四是大陆”。陈诚的报告标志着国民党已将对大陆政策从“军事反攻”转为“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72页)

三 “反攻大陆”政策的第二次大调整 ——“反攻总体战”

自从国民党八大本着较为“务实”的态度,确定了“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的策略之

后,“军事反攻”的呼声便低落下去,这又使蒋介石感到非常不满。

1959年5月19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作了《掌握中兴复国的机运》的讲话:“外电往往指责我们说,现在政府中已经很少有人再谈反攻复国的问题,又说,他们近来最乐称述的,只是台湾的经建数字的增高,他们也很少再自称为中华民国,而多是说台湾如何如何了。又说从大陆来台的人,他们也都在漫长的岁月中,淡忘了大陆上的家园,因为他们在台湾大多数都有了一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当然这只是外国记者的一种皮相的和错误的说法,但是这却足以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并没有一些可以开创中兴复国的新气象和新精神,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实在说,由于大家从大陆撤退来台,已经十年,当时国破家亡的悲哀沉痛和侮辱血债,也多少为岁月所侵蚀!又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建的发展,也有一部分人确实在特别忙于照顾自己的生活,并且企图提高其个人待遇为主要的目的,因而或多或少忘记了自己反共雪耻的责任,模糊了自己报仇复国的目标。当然还有很多的知耻奋发的同志,在埋头苦干,尤其是一般基层工作的同志,不求人知,而惟其效忠报国,在我见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更引起我对复国建国的前途无限的乐观。所以外人反多看得起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以为自由中国是有前途的。可是像前面所说的那种心理上、生活上、精神上的病态,的确是在我们中兴复国途中,第一严重的障碍;如果不予以彻底根除,并奋励其知耻雪耻的朝气锐气,那还谈什么反攻复国呢?如果再过十年,超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期限,还不能反攻复国的话,那就任何希望都要破灭了”。(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186~187页)

台湾当局体用蒋介石的意旨,将国民党八大提出的“政治反攻为主,军事为辅”、“建设台湾,策进反攻”等口号,改称为“长期的反攻总体战”。这是台湾当局对“反攻”政策作的第二次调整。其实这次调整,只能算是新瓶装旧酒,因为它的实质仍是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七分敌后,三分敌前”的反共方针下,加强对大陆的“政治作战”。

1963年11月12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反攻复国总体战”策略,陈诚在《政治报告》中称“反共作战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它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各方面,以及过去与将来的作战,并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在“总体战”中,大陆是“主战场”,台海是“支战场”,国民党的战略原则是以“政治为先锋,军事为后卫,使大陆革命与台海战争相结合”。(秦孝仪:《革命文献》,第7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49~251页)大会确定国民党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策进对大陆的“政治作战”,渗进大陆,发展“策反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工作纲领》,制定了“反攻复国”的各项具体部署,鼓吹以国民党“为领导的

核心,发挥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心理一切力量,与军事紧密配合,组成一个战斗体,完成反攻大陆的战斗准备”。(同上书,第266~269页)

四 十年一梦——“反攻大陆政策”的最终破灭

然而,海内外人士如同对国民党遥遥无期的“反攻”叫嚣持有疑虑一样,对“反共联盟”的建立反响冷落,参加者寥寥无几。蒋介石见“反共建国”的旗号不灵光了,立即乘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又提出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为此,蒋介石发出号召:“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张其成:《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09~2910页)1967年3月29日,蒋介石又向青年发出号召:“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叫嚷什么“联合所有反毛的个人的、集体的势力和组织,推翻那个口口声声造反夺权的毛贼残暴统治。不论工、农、兵、学、商,不论种族、党派、成分,亦不论以往一切是非恩怨,只要能实践‘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的信约,幡然改图,抗暴反毛的,就都是讨毛救国联合阵线的盟友斗士!”蒋介石还梦想大陆“反毛”力量会组成“讨毛救国联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存与台湾国民党的密切联系,“齐集于国父三民主义青

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下,同仇敌忾,消灭毛泽东”。(同上书,第3639页)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大陆“反毛”力量没有响应,就连台湾青年也很少问津。

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被台湾当局吹嘘得天花乱坠的“总体战”策略,依然没有任何建树。相反,大陆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23日,成功的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年的5月19日,正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最后期限。事实无情地宣布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策略的破产。尽管他在以后几年中,仍继续令“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不断设计新的方案,但这不过是聊以自慰,向世人做做样子而已。

【收稿日期】 2004-11-10

【作者简介】 王侃(1972—),男,浙江省杭州人,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责任编辑 公羽】

(上接第100页)

料。更详细、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发掘。

【收稿日期】 2004-12-20

【作者简介】 许檀(1953—),女,天津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 惟正】

参考文献:

- [1]沈传义等.光绪祥符县志[Z].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 [2]开封教育试验区教材部.岳飞与朱仙镇[M].开封:1934.

- [3]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J].史学月刊,1964,(12).
- [4]邓亦兵.清代的朱仙镇和周家口[J].中州学刊,1988,(2).
- [5]黄汴.天下水陆路程[M].杨正泰校注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 [6]明神宗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7]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J].中国史研究,2003,(1).
- [8]许檀.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J].历史研究,2004,(2).
- [9]尹会一.抚豫条教[M].光绪五年刻本.
- [10]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 [11]苏源生.鄢陵文献志[Z].同治四年刻本.
- [12]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13]杨潮观.乾隆林县志[Z].乾隆十七年刻本.